

红旗

HONGQI



一九五九年

1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五九年 第一期

目 录

社論：有历史意义的綱領性文件	(1)
一九五九年工业战綫的任务	薄一波 (6)
一九五九年农业战綫的任务	廖魯言 (11)
思想必須适合于客观規律性	范若愚 (19)
从工人詩歌看詩歌的民族形式問題	张光年 (23)
丰富多采	郭小川 (30)
一个小型鋼鉄联合企业的誕生	闞明潤 (32)
农民怎样議論按劳分配	王 录 (34)
劳动和休息 (科学小品)	树 则 (35)
照妖鏡下显原形	李 亚 (38)

——铁比集团在台湾問題上的立場說明了什么？

本期封面画由周令钊同志設計



—社論—

有历史意义的綱領性文件

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澤东同志的建議所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这个決議系統地總結了人民公社发展的經驗，从理論上和政策上对于人民公社发展中的各个基本問題，作了詳細的規定和深刻的說明。現在我們的任务是，按照这个決議，在全党全民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加强对于公社的領導，健全公社的制度，促进公社的巩固，把人民公社的工作大大地提高一步。

人民公社——这种大規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結合的、政权組織和經濟組織合一的組織形式，是我国人民群众在党的領導下的伟大創造。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大跃进，首先是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使农民群众深深感到，原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組織已經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它在規模上、活动范围上和集体化程度上，都显现出同生产力的飞跃式的发展不相适应。人們要求从原有的农业合作社前进一步。还在人民公社出现以前，各地群众已經对于农业合作社的組織和制度作过多方面的改进的嘗試。許多农业社合并成为大社，并且扩大了經營的范围，开始发展自己的工业，不少地方还实行了农业社、手工业社、供銷社、信用社的合一，許多农业社改进了劳动組織，加强了相互間的协作，这种协作有时不但超出了乡界，而且超出了县界。适应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很多农业社都办了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取消了自留地。在分配制度方面，也有一些农业社改变了原有的按劳动日計酬的办法。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产生了現在形式和現在名称的人民公社。少数公社取得成功以后，許多农业合作社把它們作为榜样，建立人民公社就逐漸地形成群众运动。毛澤东同志对于人民群众的这种創举，給予了热烈的支持，并且及时地指出，我們的方向是逐步地有秩序地組成工农商学兵相結合的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一九五八年八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會議，根据毛澤东同志的建議，作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这个決議把人民公社引上迅速发展的軌道。到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開幕的前夜，我国农村中已經有了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組織，加入公社的农户，达到了一亿二千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从一九五八年夏季算起，我国的人民公社运动还只有半年左右的历史。在这个不长



的时间内，人民公社已经在发展生产、组织分配、统一安排生活等方面，表现出了它的显著的优越性。从农业合作社转变成为人民公社，组织规模和经营范围都扩大了，生产方面和社员生活方面的集体化程度都提高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比以前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使用，便于在更大的范围内调度；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统一领导，使全国农村中实现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得到可靠的保证，农村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农业合作社转变成为人民公社，不仅实现了生产力方面的革新，而且包含了生产关系方面的重要变革。首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自留地等）消失了，集体所有制由于公社的巨大规模，大大扩大和提高了。其次，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出现了。公社和乡政权的合一，在县范围内的成立联社，国家的基层财贸机构和其他企业下放给公社和县联社管理，县联社有权统一调剂全县公社的积累，调度公社适当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都是人民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的成分。最后，许多人民公社在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其中的供给制部分开始带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的萌芽。所有这些都表明，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有长远发展的前途。正如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所指出的，人民公社这种崭新的制度，“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

全会决议所指出的这些发展方向，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来说，当然是早已确定了的；但是究竟采取什么具体的形式来实现这些发展，却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大家知道，在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这些形式，以及在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这些形式，都曾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人民公社这种形式的发现，比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各种形式当然具有更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在我国条件下，人民公社不但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形式（这已经首先在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在全国开始普遍地实现工农业同时并举方面得到了证明），而且是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又是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人民公社现在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和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而且如中央的决议所说，在我国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仍将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这也是符合于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所提出的理想的。因此，人民公社的发展，不但在目前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随着历史的前进，它还将愈来愈显出它的伟大的意义。



对于我国的大跃进和公社运动的伟大胜利，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感到惊慌，因此拼命加以攻击和污蔑。他们竭力把我国的公社描写成为凶恶可怕的怪物，把公社的胜利说成是强迫的结果。他们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国的五亿多农民对于公社的成立和发展如此欢欣鼓舞，为什么我国的农业和农村工业在公社的领导下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是各国资产阶级在对劳动人民采用了一切强迫手段之后所无法达到的。他们也知道，他们不可能破坏我国的公社运动，于是他们只好不断地预告着公社的失败，好象他们如果不能由此多少获得一些安慰的话，他们就连呼吸都要发生困难似的。

同反动派的这种白痴式的幻想相反，我们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一致通过的决议中，肯定了公社运动的伟大胜利和伟大前途，并且为它今后的发展和巩固规定了明确的方针。

为了使得全国的人民公社迅速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详细地讨论了公社目前所面对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并且澄清了在公社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误解。决议着重指出：农村的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它们要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至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那就需要经过一段更长的时间。

人民公社运动是我国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一次伟大变革。这个变革是在客观条件成熟和广大农民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实际生活已经证明，这个得到群众热烈支持的变革，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和群众觉悟的继续提高。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为了巩固已有的胜利，并且通过人民公社的巩固，继续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群众觉悟的提高，就必须在工作中永远坚持群众路线，永远重视群众的自觉自愿。群众的觉悟首先产生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因此，关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度、分配制度、生产经营、生活福利等等问题的处理，都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从群众的自觉自愿出发，从生产发展的需要出发。在这些方面，决不允许过于性急，把将来的理想当做当前的任务，勉强做条件还不具备的事情，因为那样就将不利于公社的巩固，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指出，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者。革命的各个阶段是互相联系的，我们不能使革命停顿下来，而应当领导它不断前进，要善于在革命发展的每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革命的各个阶段又是互相区别的，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任务，我们必须把每一阶段的基本性质弄清楚，据以制定符合实际需要的方针和政策。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这就是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毛泽



东同志在领导我国人民革命的事业中，一贯地坚持了这个原理。为了认清这个原理，回顾一下我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前，我们党内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的争论是有益的。在过去的不同时期内，一切右倾的错误观点（陈独秀的观点，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陈独秀主义者的观点），都是不承认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衔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原理，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投降主义的纲领和政策；而一切“左”倾的错误观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的观点），都是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冒险主义的纲领和政策。毛泽东同志既反对把革命停顿在民主革命阶段，也反对急于跳过民主革命阶段。他一方面坚持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要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便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实现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另一方面又坚持不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混淆起来，坚持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不采取超出民主革命范围的政策。大家知道，我国的革命正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取得胜利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把革命的前后阶段比喻为互相关联的两篇文章，他说：“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批评一种“左”倾空谈主义的时候，曾经这样来说明革命的前后阶段不能混淆：

“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到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虽然是二十年前讲的，所提的问题，虽然和我们当前遇到的问题在性质上和内容上都不相同，但是对于我国当前的革命事业的继续发展，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观点出发，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人民公社所有制的问题上，既肯定目前公社已经有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



成分，并且指出，必须采取适当步骤，促进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同时又肯定，目前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必须根据生产发展的水平和群众觉悟的水平，不可过于性急。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全会既肯定在公社的分配制度中已经有了共产主义的萌芽，并且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人民公社的发展，共产主义的因素将逐渐增加，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将逐步成熟；同时又肯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人民的任务仍然是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在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我国才能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全会的决议明确地划清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界限，又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根据这些，制定了有关人民公社的各种方针和政策。决议指出，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公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因为这是全国公社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向前迈进的指路明灯。这个决议不但适应于目前，而且适应于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指导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向前发展的纲领性的文件。决议给全国人民和全国公社指出了无限伟大的远景：通过国家的工业化和公社的工业化，通过农业战线上实现深耕细作、少种多收的大革命，通过全国文化教育事业和公社文化教育事业的高涨，我国将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建设成为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同时，将在物质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决议对于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劳动、学习、休息的安排，妇女、儿童、老年的照顾，人民的饮食、居住和家庭生活，乡村、市镇以至整个大地的园林化，都表现了密切的关怀。决议特别强调了在公社中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实行管理民主化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使人民群众得到了巨大的鼓舞。

让帝国主义分子对我们党的决议叫嚷什么“退却”之类的梦话吧！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从全会决议中获得了极大的力量和信心，并将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一致努力，为执行这个决议而坚决奋斗。毫无疑问，我们的人民公社的事业将在全会决议所确立的基础上蒸蒸日上，我们的公社将迅速获得巩固，我们的工农业将在一九五九年继续跃进，我们在一九五九年的新胜利将继续使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发抖！



一九五九年工业战线的任务

薄一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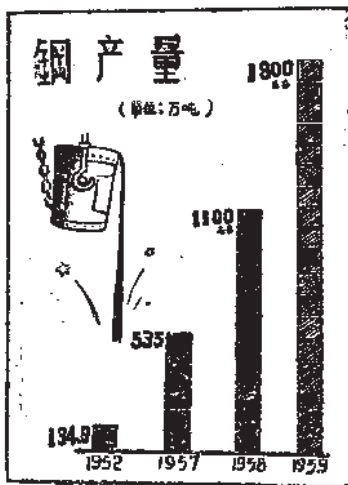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九五八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一年里，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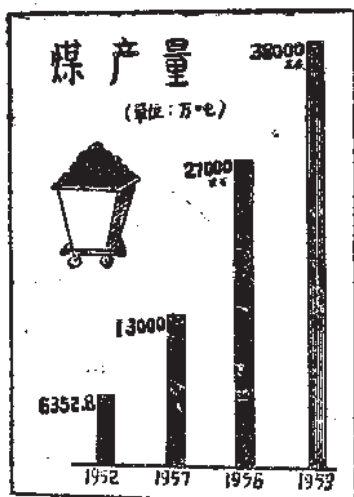
根据现在的预计，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六十五左右。主要工业产品中，钢增长一倍以上，达到一千一百万吨左右。在钢铁工业的带动下，机床增长两倍以上，达到九万台左右；煤炭增长一倍以上，达到两亿七千万吨左右；电力增长百分之四十二以上，达到二百七十五亿度左右。随着重工业的迅速发展，轻工业也有很大的增长，其中棉纱增长百分之四十三，达到六百六十六万件左右。一九五八年我国国民经济的跃进，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跃进，同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对照，使全国人民对于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快地改变国家面貌、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迅速超过英国等各项任务的实现，充满了信心。

一九五八年我国在工业战线上取得伟大的胜利，有多方面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由于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认真地反对了保守思想，破除了迷信，认真地执行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一年来的实践，进一步地证

明了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在工业战线上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在目前时期以钢为纲和全面跃进相结合。这一整套方针，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因而它们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进一步贯彻执行这一套方针，我们不但有可能在一九五九年继续跃进，并且有可能跃进得更好。

我国工业的发展，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一九五九年将实现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按照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九五九年计划指标，我国工业的生产将继续保持





同一九五八年大体相同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大多数工业产品增加的绝对数量，也将比一九五八年大或者差不多。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

年，钢增加了五百多万吨，煤增加了一亿四千多万吨；而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钢将增加七百万吨左右，煤将增加一亿一千多万吨。其他许多重工业和轻工业产品的产量，增加的绝对数量也将是很大的。实现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我国就将在钢、铁、铜、铝、机床、发电设备等产品产量方面，分别接近、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至于煤炭和棉织品，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一九五八年就已经超过英国了。

由此可见，一九五九年的工业发展计划，仍然是一个大跃进的计划，是一个多快好省的计划，是苦战三年期间一个带有决定意义的计划。人们在一九五八年已经看到，使钢产量从五百多万吨增加到一千一百万吨，我国只用了一年的时间；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的历史表明，英国经过了三十二年，美国经过了七年，日本经过了二十年。人们在一九五九年还将看到，我国的钢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而同样的增长过程，在

美国经过了五、六年，在英国经过了十八年。在旧中国，钢的最高年产量只有九十多万吨，解放以后的十年中间，我国将使钢产量增长到二十倍；而一九五九年一年增加的七百万吨左右，就大体等于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的八倍。由此又可见，不论是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来比较，或是同我国的历史来比较，一九五九年钢铁的增长速度都是很快的。当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六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年产钢一千八百万吨，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但是，从一九五八年钢产量增长的速度和一九五九年钢产量将要达到的增长速度可以看到，我国工业的高度现代化，既不需要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过漫长的道路，也不需要象我们前几年曾经设想过的那么多的时间，这不是愈来愈清楚了吗？

那么，这个跃进计划是不是有可能实现呢？我们认为不仅可以实现，而且还可能超额完成。因为这个计划指标是充分地估计了客观可能性以后提出来的。以钢产量为例，按生产能力计算，一九五九年我国十八个钢铁重点企业的炼钢能力可以达到一千六百万吨左右，正在建设的二十四 个中型钢厂的炼钢能力和现在主要机械厂的炼钢能力可以达到六百万吨左右，其他小炼钢炉的能力还未计算在内。炼钢所需要的生铁，也完全有把握供应；炼钢、炼铁所需要的焦炭、洗煤、铁合金、耐火材料，在增加必需的设备以后，也都可以解决；轧钢设备能力，也可以保证钢能成材。其他重工业部门，特别是电力、运输等部门，也将能够按比例地向前发展。同时，



由于一九五八年农业的大丰收，我们能够相应地发展轻工业（主要是纺织工业和造纸工业等）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以适应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

当然，要实现一九五九年的工业大跃进计划，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也可能遇到各种困难。我们一定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又一定要在战术上重视困难。我们必须从一九五八年的丰富实践中吸取经验，提高认识，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经过巨大的努力，进行英勇的劳动，才能完满地实现一九五九年的计划。

一九五八年的实践证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大家都已经看到，当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解放思想的号召，树立起敢想敢说敢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风格，打破了阻碍工业发展的各种迷信和清规戒律以后，在工业战线上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奇迹，不但工业发展的速度一天高过一天，而且工业在城市和乡村到处开花。为了从精神方面准备条件，来迎接新的更大的胜利，我们应当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思想解放的过程，就是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客观世界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的，为了使我们的思想不至于僵化，不至于落在客观形势的后面，我们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抛弃陈旧的观念，接受新生的事物，使自己的认识，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和变化而一步一步地提高。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应当而且必须在实践中统一起来。解放思想并不是要我们不

去研究客观世界，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而是要使我们的思想能够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使我们的认识能够更好地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是追求真理的人，是胆大心细的人。我们敢于破除一切迷信；同时，我们必须尊重科学，勤恳地钻研一切科学，采取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切问题。

要实现一定的经济任务，不仅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而且要具备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只见物，不见人，把物质技术条件的作用绝对化，认为人只能受它的支配，看不到或者不承认人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不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正是由于我们批判和克服了这种错误倾向，大大发扬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因而在工业战线上以至整个经济战线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我们在今后应当继续批判这种只见物不见人的错误倾向，并且同那些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来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观潮派、算账派，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应当指出，我们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不是要否认物质技术条件的作用。只见物，不见人，当然是错误的；同样，只见人，不见物，也是错误的。谁都知道，经济的发展是受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制约的。比如，炼铁炼钢，就需要矿石、煤炭、电力和高炉设备、平炉设备等各种物质技术条件，缺乏这些条件，就不能进行生产。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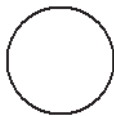
同志說過：“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我們指導經濟工作，正如指導戰爭一樣，必須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來爭取勝利，但是決不應當因此否認或者忽視物質技術條件的重要作用，決不能夠超越客觀條件的可能來計劃自己的行動。我們必須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意見，在經濟工作中適當地對待客觀條件和主觀能動作用的關係，把兩者正確地結合起來，以便我們能夠有充分的保證來取得勝利。

要使工業高速度地發展，必須全黨動手，把集中領導和大搞群眾運動結合起來。我們在一九五八年，由於開展了全黨全民大辦工業和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既有大型企業、洋法生產的群眾運動（“大洋群”），又有小型企業、土法生產的群眾運動（“小土群”），這就打破了只靠少數人辦工業的冷冷清清的局面，出現了全民辦工業的轟轟烈烈的新局面。這一個全民辦工業的運動，不僅使我國的工業生產量得到了很大的躍進，而且極為廣泛地使工人、農民和城市居民受到了一次工業教育、技術訓練和勞動鍛煉，起了煉鋼又煉人的作用，同時也使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有了進一步的結合。

對於在工業戰綫上大搞群眾運動，曾經有一些人抱着懷疑態度，他們認為採取群眾路綫的方法辦農業可以，辦工業就不可以；辦小型工業可以，辦大型工業就不可以。他們總是想用單純的行政命令、死

板的規章制度來辦事情，而對群眾路綫的工作方法加以抵制。他們不懂得，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是最廣大群眾的切身事業，如果不依靠最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是不可能高速度發展的。當然，群眾運動必須同集中領導密切結合起來。群眾運動越開展，就越需要黨的堅強的領導。各級黨組織和經濟工作人員，應當經常把當前的任務和完成任務的方法，以及可能出現的困難，向群眾交待清楚，並且發動群眾展開鳴放辯論，傾聽群眾的意見，集中群眾的智慧，發揮群眾的力量。應當貫徹執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每個幹部都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同群眾打成一片，關心群眾，了解群眾。應當全面地抓思想、抓生產、抓生活，群眾的干劲越大，就越要關心群眾的生活。同時，應當引導群眾不僅關心當前的利益，而且關心長遠的利益，不僅關心局部的利益，而且關心全局的利益，使當前的、局部的利益服從於長遠的、全局的利益。我們要使各地方的每個公社、每個企業單位和每個事業單位的群眾都能夠自覺地為統一的國家計劃而奮鬥，為實現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和各項方針、政策而奮鬥。

要迅速發展國民經濟，還必須執行重點突出、全面安排的方針。一九五八年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確定了發展工業在目前時期必須實行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方針。執行這個方針的結果，使得鋼的產量迅速地增長上去。雖然在一個短時期內，曾經把某些東西擠了下來，某些部門出現了互不適應的情況；但是由於鋼鐵工業一方面向



有关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又给有关部门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所以，总的说来是带动了机械、煤炭、电力等各个工业部门以及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以纲为纲来安排整个工业建设，而不是把各个工业部门机械地平列起来，这就使我们的工业发展有了带动全局的中心。只有纲举，才能目张；只有抓住重点，才能带动全盘；只有以纲为纲，才能全面跃进。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不仅钢铁工业内部应当如此，而且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之间，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即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之间，生产和基本建设之间，生产和流通之间，生产和消费之间，也应当如此。这也就是说，都要有全面的安排，都要使它们按比例地向前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最充分地、最合理地、最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才能争取工业的高速度发展。

这里应当说一說，在工业的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的平衡的问题。我们在一九五八年，曾经对于使先进迁就落后的消极平衡论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那是完全必要的，不如此就不能反对掉右倾保守思想。在今后，我们还必须继续反对消极平衡论。但是，反对消极平衡论，并不是说不要平衡。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告诉我们：“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

暂时的相对的統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說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統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統一成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这就是我們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局部的調整。”人們知道，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批判消极平衡论的同时，就提出了使落后赶上先进的积极平衡的主张，就指出了，为着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需要保持一定时间、一定范围的平衡，并且指出，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工作的任务。

放在我們面前的一九五九年发展工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只要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沿着一九五八年的胜利道路英勇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任务。我們在工作中，一定要坚持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原则，我們一定要继续保持冲天的革命干劲，同时又要对任何事物进行科学分析。我們过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冲昏头脑，漠视工作中的缺点，不去努力改正这些缺点。我們每一个做经济工作的同志，都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把工作越做越细，越做越好，使自己又红又专，善于区别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力求对情况的判断和工作的布置切合实际。这样，我們就一定能够在一九五九年这个对苦战三年有决定意义的一年中，实现比一九五八年更大的全面跃进。



一九五九年农业战线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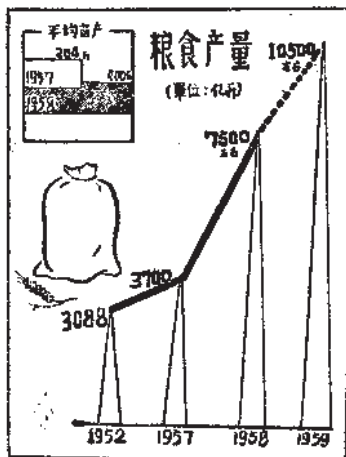
廖 鲁 言

一九五八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一年，是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伟大胜利的一年，也是我国的农业生产获得空前未有的大丰收和更无前例的大跃进的一年。在除旧岁、迎新年的时候，我们应当回顾一下一九五八年在农业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丰富经验，来迎接新的一年所带来的新任务，并且信心百倍地、再接再厉地为实现一九五九年的新任务而奋斗。

五八年我国的农业生产，的确是空前的大丰收和大跃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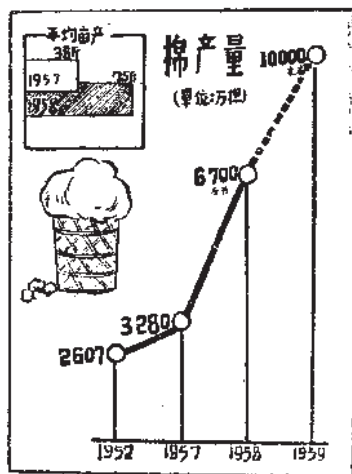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总产量，预计为七千五百亿斤左右，比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加三千八百亿斤左右。棉花总产量六千七百万担左右，比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二百八十万担增加三千四百万担左右。一九五八年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一倍，还略有超过。大豆、花生、油菜籽和芝麻等油料作物也有很大的增产，除去不用于榨油的以外，可生产的食用植物油，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烤烟、甘蔗和甜菜的产量都是成倍地增长。麻类、蚕丝、茶叶和水果等农产品的增长比例，为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不等，也都是显著地增产。畜牧业的发展也是历年少有的，大家畜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五百多万头，羊增加三千万只，猪增加六千万头左右。这一切都说明，一九

一九五八年各种农作物产量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播种面积增加得并不多。例如，粮食作物的亩产量，按播种面积计算，包括薯类在内，平均由一九五七年的二百零四斤提高到四百斤以上，薯类除外，平均由一百九十六斤提高到三百五十斤以上，都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一倍左右；按耕地面积计算的粮食亩产量，全国已有四分之三的县（市、旗）达到或者



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在十二年内达到的亩产指标。棉花的亩产量，由三十八斤提高到七十五斤，也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一倍。全国绝大多数棉田的亩产量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在十二年内达到的水平。在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的基础上，还涌现出许多大面积的高产田和小面积的卫星田，例如，粮食作物（不包括薯类）亩产千斤以上的，据不完全的统计，有一亿六千万亩左右，约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十分之一。一九五八年许多农作物的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成倍地增长，一年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增长的总和。这一事实，把所谓“农业增产速度一年只能增加百分之几，不能更快”的陈腐论调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一九五八年农业跃进的形势，还表现为“低产变高产，高产更高产”。许多低产地区，例如陕北的榆林和雁北的朔县等等，都已经翻了身。一些历来被认为是低产的作物，例如麦子、芝麻等，

的思想。同时，正如党中央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在一九五八年大丰收的事实面前，好心肠的人可以摆脱这种忧愁了，资产阶级的人口论者也应当得到了教训。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诅咒我们，说我们“无法摆脱人口多、增加得快，而农产品增加很慢的矛盾”。我国农业大跃进的事实也给了他们以无情的打击，并且将继续给他们以无情的打击。事实是最雄辩的。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无可争辩地说明了，在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在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又取得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会发挥出人们想象不到的、不可估量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也放出了“高产卫星”，摘掉了“低产帽子”。这就打破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旧观念，解放了人们

二

一九五八年农业大跃进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我以为，可以集中起来，归纳为三条：“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和“八字宪法”。

第一，“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实质就是加强党的领导。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就是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伟大成果。一九五六年下



半年和一九五七年春天的“反冒进”，“右倾保守、甘居下游、少慢差费”所带来的教训在我们的头脑中还是记忆犹新的。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实行“政治挂帅”。离开了党的领导，还谈得上什么“政治挂帅”？又是用什么“政治”去“挂帅”呢？只有加强党的领导，在干部和群众中广泛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才能同各种错误的倾向展开斗争，也才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这就是“政治挂帅”。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解放思想，这也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一条重要经验。而敢想、敢说、敢做，就有一个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的问题。我们要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客观规律去敢想、敢说、敢做，而不是离开马列主义、离开科学去乱想、乱说、乱做。所以，敢想敢说敢做也必须紧密依靠党的领导，也要“政治挂帅”。

第二，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无论在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 and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战线上，群众路线这个传统的优良作风，是取得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重要“法宝”。在全党全民整风运动中创造出来的，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各项工作中普遍应用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做什么，鸣放什么，辩论什么，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新形式，也是群众路线的一种新创造。干部、群众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种试验田，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这是在领导群众生产、

向自然界作斗争方面，贯彻群众路线的一种新创造。“抓两头、带中间”的领导方法，也就是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种具体方法。现场会议这种推广经验的新方式，则是把大家直接带到群众新创造的现场去“取经”，就地总结经验，实地观摩学习，回去推广，收效大而且快，这也是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种新方法。这一切说明，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有了很好的发扬和新的的发展；也正是这种发扬和发展，保证了一九五八年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大跃进。

第三，“八字宪法”。水（水利）、肥（肥料）、土（深翻地、改良土壤）、种（良种）、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工（工具改革）、管（田间管理），这八个字，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农民群众增产措施的经验而提出的“八字宪法”。一九五八年的实践证明，那里认真贯彻执行了这个“宪法”，那里的农业生产的增长幅度就比较大；那里贯彻执行这个“宪法”比较差，那里的增产幅度就比较小，或者增产的比例很小，或者没有增产，个别的县、乡和公社甚至减产。当然，“八字宪法”的每一个字的具体做法，应该因地制宜，不同的作物和不同的品种也应该有不同的做法，不是千篇一律的。但是，做法尽管不同，总的来说，必须认真执行这个“八字宪法”，则已经成为公认的结论。这是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在增



产技术措施方面的一条根本经验。

三

全国农村（除个别地区以外），从一九五八年八、九月起，经过几个月的时间，迅速地顺利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是一九五八年农业战线上又一个伟大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胜利。在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后，经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全党全民的整风运动、全民性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大斗争、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比较彻底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也解决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和“右倾保守、甘居下游、少慢差费”这两条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中究竟采取那条路线的问题，还进一步解决了发扬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来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的问题，因而引起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和全民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大解放。人民公社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中央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人民公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党的社会主义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产物。”

人民公社一成立，就表现了比以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大的优越性。人民公社

的组织规模比以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在一九五八年初，全国有七十四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每社平均约一百七十户，三百几十个劳动力（其中大批的妇女劳动力还束缚在繁重的家务劳动中），二千多亩地。现在的两万六千五百多个农村人民公社，每社平均将近五千户，有一万个左右劳动力和六千亩左右的土地。社大人多力量大，劳动力、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统一规划、统一调配、统一使用，因而使用得更合理、更有效。以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上是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现在的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工业和农业并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土化肥、土农药以及土水泥和砖瓦等建筑材料的制造，土机械和农具的制造和修理，农产品的加工和综合利用，以及挖煤、采矿、炼铁、炼钢等等小型工业，已经由农村人民公社到处兴办起来。原来由国家经营的农村商业和银行等机构，也下放给人民公社。社办小学、中学和红专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人民公社还运用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实行劳武结合，在各级生产组织中，相应地建立民兵组织。同时，现在的农村人民公社又是同基层政权合而为一的。所以说，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

从人民公社成立到现在，并不是农闲季节，而是农忙季节。秋收、秋耕和秋种的三秋工作十分紧张，因为农业大丰收，



秋收的工作量比往年成倍地增长了。一九五八年秋季深翻土地的任务，到十一月底的统计，已经完成了约七亿亩。种麦三亿七千万亩，加上其他夏收的杂粮和冬油菜，秋种的面积达五亿五千万亩以上，并且耕得比往年深，种得比往年好。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还掀起了一个全民炼钢铁的高潮，许多人民公社一成立就抽调出百分之三十甚至一半左右的劳动力，去挖煤、炼焦、烧木炭、采矿、炼铁、炼钢，到处建立起来了土炼群，这对于完成一九五八年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起了巨大的作用。如果不实行人民公社化，要在粮食、棉花产量翻一番的同时，在紧张的秋忙季节，从农业战线抽出这样大量的劳动力到工业战线上来，那是不可想象的。秋收、秋耕、秋种和大办钢铁同时并举，就是人民公社巨大优越性的有力的证明。所以说，“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农村人民公社化的新形势，显然是为争取一九五九年农业更大的丰收和全面的跃进准备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目前的人民公社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它的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还需要经过一段相当的时间，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时间需要的更长。但是，人民公社却“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

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所以说，农村人民公社化是一九五八年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的伟大胜利。

四

一九五八年农业战线上的成就是空前伟大的。但是农业生产并没有完全“过关”。第一，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总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不过一千二百斤左右，要实现每人两千到三千斤的要求，还要在一九五八年产量的基础上再增产一倍到两倍。薯类在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总产量中约占四分之一，今后应该适当地压低薯类的比重。第二，一九五八年的棉花总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不过十斤，要实现“丰衣”，也还要在一九五八年的基础上再增产一倍到两倍。第三，油料作物和麻类的生产还根本没有过关，食用植物油和麻的供应，目前还是紧张的。第四，历来闻名于世界的茶叶和蚕丝，产量还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第五，畜牧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畜力仍感不足，家畜家禽仍不能满足城乡人民日益增长的肉食的需要。这是农业生产上的五关。要过这五关，还必须继续鼓足干劲，跃进再跃进。任何松劲和泄气的情绪，都是有害的。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一九五九年的粮食总产量要增加到一万零五百亿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三千亿斤左右；棉花总



产量要增加到一亿担，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三千四百万担左右。这个要求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应该力求实现，并且争取超过。在粮食方面，凡是按城乡人口平均还不到两千斤的省区，除个别条件特殊的以外，一般应该争取达到两千斤；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两千斤的省区，应该争取超过两千斤，并且向每人平均三千斤而努力。一九五九年应该力争油料作物和麻类的生产过关。油料作物的全年产量，除去不用于榨油的以外，要求做到生产食用植物油不少于六百万吨。茶叶、蚕丝和各种工业原料作物，都要有更大的发展，并且努力垦复旧有的和培植新的茶园和桑林、柞树林，以便在较短的时期内，不仅恢复到而且大大超过茶叶和蚕丝的历史最高水平。在大家畜方面，要力争适龄母畜的满怀，开展“全配种、全准驹、全保胎、全成活”的“四全运动”。猪、羊也要有较大的发展，不仅要求有较快的发展速度，还要求保证一定的屠宰率、出肉量和上市量。鸡鸭蔬菜的生产，也必须有很好的安排，保证城乡人民肉食、蔬菜等副食品的供应。农村人民公社应该把供应城市人民的副食品当做自己的一项重要重要责任。

为了实现一九五九年更大的丰收和农业生产的全面跃进，首先要抓紧当前的小麦和油菜等越冬作物的田间管理，做好冬灌和追肥，消灭三类苗。还要抓早稻，现在就要做好开春后早稻播种的准备工作。抓紧小麦、油菜和早稻，保证一九五九年

第一个收获季节的大丰收，这是争取全年大丰收的第一个关键。农业“八字宪法”中，水、肥、土、种、工具改革和防治病虫害等，都是要在冬季做好准备工作的，都是农村冬季生产的重要内容。“一年之计在于春”的老话，在农业生产上早已不适用了，而是“一年之计在于前冬”，冬季生产和为一九五九年春耕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必须切实做好。

争取一九五九年大丰收的第二个关键是，努力开展大面积高额丰产田运动。一九五九年的棉花、油菜、大豆等作物的播种面积，预计并没有什么增加，或者增加不多，粮食的播种面积还将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些，增产的主要途径是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九五八年，粮食千斤亩有一亿六千万亩，亩产百斤皮棉以上的棉田约占植棉面积的五分之二左右，这就是一九五九年开展大面积高额丰产田运动的实际根据。一九五九年必须普遍地、切实地、更好地贯彻执行农业生产措施方面的“八字宪法”，改变过去的浅耕粗作、广种薄收为深耕细作、少种多收，保证大面积高额丰产田运动的胜利实现，保证粮、棉、油和其他各种工业原料作物的增产指标的完成和超额完成，争取农业生产更大的丰收和全面的跃进。

同时，一九五九年大面积高额丰产田运动的成功，也就为实现耕地利用的“三三制”和大地园林化奠定初步的基础，我们将更有把握地、信心百倍地在相当的时期



内实现毛澤东同志关于大地园林化的伟大理想。

五

农业生产不只是农作物的种植，必須是农林牧副漁的全面发展。农业、林业和牧业更是相互結合、相互依存的。中央指出，随着粮食問題的解决，应当逐步提高棉、麻、蚕絲、大豆、油料、糖料、茶叶、烟叶、药材等工业原料作物在全部农业生产当中所占的比重，并且极大地注意加速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漁业的发展；并且指出，一定要在农林牧副漁五业中来一个全綫大革命，彻底改变整个农业战綫的面貌。

根据中央的指示，农村人民公社发展生产的方針应当是：“根据国家統一计划和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勤俭办社的原则，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自給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农村人民公社应当随着大面积高额丰产田运动的成功，“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針的实行和耕地利用的“三三制”的逐步实现，而逐步地把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战綫轉移到工业战綫上来，大办工业。全国六分之五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局面，必須改变，否则，我們的国家就沒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的工业，就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也就不能根本改变我們国家的面貌。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逐步实现公社工业化，不仅将加速我国工业化的过程，而且将在农村中

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縮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

当然，公社工业化和农林牧副漁五业的全綫大革命，彻底改变整个农业战綫上的面貌，并不是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内就可以完成的。但是，一九五九年必須在这一方面前进一大步。因此，各个地方和各个人民公社，在制定一九五九年计划的时候，除了規定粮食的增产指标以外，还需要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定出棉、麻、油和其他各种工业原料作物的增产指标、林牧副漁业生产的发展指标和社办工业的指标。粮食和各种工业原料作物、农业和林牧漁副业和社办工业相互之間也有一个一定的比例关系。以前有許多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从事粮食生产，粮食在总产值中占的比重很大，今后必須在繼續增产粮食的同时，把粮食在人民公社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压低。

只有多种工业原料作物，扩大多种經營，发展社办工业，才能大大增加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真正实现自給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就能够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經濟以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就农村人民公社而言，也只有商品生产的大发展，人民公社“才能够換回必要的机器和設備，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也才能够換回所需要的消費物資和現金，以便供应社員和发放工資，并使工資逐步增长。”現在，有一些主要生产粮食的人民公社，多余的粮食，特别是



薯类，加工出售一时来不及，公社的现金周转不灵，生产投资和工资开支也发生困难。这就是很明显的例证。所以说，发展商品生产是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的一项重大措施。

一九五九年，在继续增产粮食的同时，必须在大大发展各种工业原料作物方面，在加速发展林业、牧业、渔业和副业生产方面，在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就。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努力争取一九五九年农作物的大丰收，实现农林牧副渔五业和社办工业的全面大跃进。

六

最后，为了实现一九五九年的新任务，必须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任何松劲泄气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有害的，都必须坚决地加以反对。同时，冲天干劲又必须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在工作中要热又要冷，这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两者必须统一起来。爱冷不爱热，是不行的。没有冷静的头脑，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也是不行的。这也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取得的另一面的经验。我们必须把革命的热情和务实的精神结合起来，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制定生产计划指标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实现指标的根据，指标要建立在客观实际可能性的基础上，就是说，要建立在现实的可能性的基

础之上，而不要建立在没有客观可能性的空想的基础之上。在执行生产计划的全部过程中，也都应该实事求是，力戒浮夸和弄虚作假。经济工作必须是越做越细致、越踏实。

一九五九年是苦战三年中具有决定性的一年，是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的第一个生产年。一九五九年农业战线上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也是必须完成的。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取得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农村已经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个有利的新形势下，一九五九年农业战线上的巨大任务也是完全有可能完成的。必须在当前的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运动中，结合当前的冬季生产和春耕工作，认真地学习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在思想上提高觉悟，统一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在组织上建立和健全公社的制度，搞好生产，搞好生活，发扬群众路线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加强党的领导，从而在一九五九年在农业战线上取得更大的丰收和全面的跃进。

我们的口号是：丰收再丰收，跃进再跃进！



思想必須适合于客观規律性

范若愚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指导下，我国人民發揮冲天的革命干劲，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巨大跃进。为什么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能够有这样巨大的作用，这是值得想一想的。

在党的八大二次會議以前，人們对于我国應該采取什么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設，曾經有一个时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一种思想認為應該采取多些、快些的方法来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这就是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历来很明确的思想；另一种思想却認為應該采取少些、慢些的方法来进行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以为不这样就会“冒进”。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結果。一九五六年，由于执行了毛澤东同志所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就使我国整个經濟和文化事业获得了飞跃的发展。一九五七年，由于有些同志把一九五六年的跃进認為是“冒进”而加以反对，并且怀疑多快好省这一建設方針的正确性，就影响了生产建設战綫上、特别是农业战綫

上的进展，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在一个短的时期內走了点弯路。一九五八年，由于人們接受了一九五七年的教訓，改正了錯誤的思想，一致地执行了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就出现了工农业生产和各項事业的全面大跃进的局面。我們从三年来的这种两头高、中間低的馬鞍形的曲折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当思想比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規律性的时候，人們才有可能取得胜利，人們对客观規律性反映得越是正确，才有可能取得越大的胜利。一九五八年我国在发展国民經济上所取得的空前伟大的胜利，首先是由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的指导，而党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并不是由人們随心所欲地制定的，它是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客观規律性制定的。

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之所以有力量，所以能够动员群众而取得伟大的胜利，首先是因为，它是正确的，它所包含的全部内容都是从客观的实际得来的。例如說，調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具有社会主义的革命积极性，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又如說，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这是因为，在人民內部存在着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和敌我間的矛盾性質不同，它們要求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經過批評或者斗争，就能使人民內部矛盾得到正确的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党的总路线正是从这些客观事实出发，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要求，以求达到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最广泛地团结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的目的。又如，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三者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就不能装备和发展轻工业，就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同时，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又必然要求轻工业和农业迅速发展，为它提供资金和市场等等。党所提出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正是反映了这三者之间客观存在着的关系。同样的，在工业战线上，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集中领导必须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以及在目前时期实行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也是对于客观存在着这种种关系的正确反映。我们之所以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因为事实上这一条腿或那一条腿在孤立起来的时候，都各有其局限性，而在他们彼此适当地结合起来的时候，就能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正因为如此，人们如果只要一条腿，例如只看到大型企业的好处而抹煞中小型企业的作用，就不能在工业建设中迅速前进；如果只要中小型企业而不要大型企业，同样也不能迅速前进。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解释“实事求是”这句话的精神时写道：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这就是说，在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人们发现了事物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的关系，只能这样不能那样的必然的关系，人们的思想就能够符合于客观规律性，就能够根据客观规律性来正确地规定自己的行动方针。

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当人们尚未充分认识和掌握总路线所反映的客观规律的时候，建设的速度就比较慢；反之，当人们比较充分地认识和掌握了这些规律的时候，建设的速度就比较快。当人们的意志尊重这些规律的时候，就出现了建设的高潮；反之，当人们不尊重这些规律的时候，就出现了建设的低潮。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一九五八年取得的伟大胜利，不是又一次生动地、具体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反复教导我们的这些话吗？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正确地反映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规律。我们有了总路线作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导，我们的行动就有了总的方向。但是，我们要做好每一件具体事情，还必须懂得那些具体事情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事情都和总路线有关，所以说总路线照耀着我们的一切工作。认真地执



行党的总路綫，就使我們在一切具体工作中不至于迷失方向，也就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具体工作中的規律。但是要找到每一件工作中的規律，也还是要經過許多的努力，要不断地总结經驗，要認真地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一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部門的工作中，都在党的总路綫的指导下，逐步地寻求和摸索到了各种具体工作中的規律，所以各个部門的工作才能得到巨大的跃进。

有人因为一年来我們做到了过去沒有想到过的許多事情，就觉得可以不顧是否符合于客观規律性，不顧是否为客观条件所許可，凡事只要想到就能做到，或者觉得只要有了政治挂帅，任何不可能的事情都可以变为可能，任何常規都可以打破，这是不正确的。如果人們想到的是符合于客观規律的，为客观条件許可的，那当然有做到的可能，而且有努力做到的必要；由于墨守成規，迷信某种虛假的“权威”，而不敢大胆地想，大胆地做，是錯誤的。但是，如果人們想到的是不符合于客观規律的，为客观条件不許可的，那就根本沒有做到的可能，而且也不應該故意去违反这些規律而招致必然的損失。为了鼓舞人們敢于破除迷信，認真地进行实事求是的思考，敢于追求符合于客观規律的正确認識，以正确的認識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类生动的口号是有意义的。因为只要我們的思想符合于实际，那么我們就一定能够經過努力而实现我們所預期的目的。但是，这决不是说，人們可

以否認客观規律、超越客观条件的許可而乱撞乱碰。我們必須記住：人們的思想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規律性，乃是決定一切事情成敗的根本原因。

由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規律性是事物的內部的、本質的联系，所以它不是一下子就能为人們发现的。人們对客观規律性的認識，总是要經過逐步发展的过程，从不完全的認識一步步发展到比較完全的認識和完全的認識，在这种过程中必須不断地改正錯誤，人們所达到的認識是否正确，还要經過实践的考驗。人們必須經過实践来使認識不断地向前发展。党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中形成起来的，在一九五八年全民动員的伟大实践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們对于一件事情的客观規律的完全的認識，往往要在事物的发展已經暴露出它的固有的本質，事物的內部联系已經比較明显地呈现在人們的眼前，人們已經能够有根据地观察出它的整个发展趋势和前途的时候，才能达到的。因此，人們在寻求、摸索客观規律的过程中所想所說所做的，不免有些会是不合規律的。重要的是，人們在認識客观規律的过程中，必須实事求是，力戒浮夸；应当細致研究，不应簡單輕率。毛澤东同志在“实践論”中說：“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须經過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须从感性認識跃进到理性認識。”



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种方法，認真做下去，我們才能逐步做到認清事物发展的客观規律性。有些人用主意、定計劃，不是根据从实践中来的丰富感觉材料，只是凭主观臆想；或者虽然占有了材料，但不經過思考作用去伪存真，而是真偽并存，甚至去真存偽；在实践中已經发觉了原来的主意、計劃的缺点和錯誤，也沒有勇气及时糾正，甚至隱瞞起来。这样的作风不改变，就不可能認識事物的客观規律性。

当人們还不認識事物发展的客观規律性的时候，思想就不能解放，行动也不能自由；反之，当人們認識了客观規律性的时候，思想就解放了，行动也自由了。人們对于客观規律性認識得愈正确、愈深刻，思想就愈解放，行动就愈自由；人們也就能在更大范围内發揮主观能动性来促进历史的必然性的实现。一年来，由于在党的总路綫的指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敢想、敢说、敢做的风格，反对了右傾保守思想，破除了迷信，鼓起了建設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大大發揮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使得有許多过去認為是不能实现的事，現在出乎意料地但是合乎規律地实现了。毛澤东同志在“論持久战”中說：“指导战争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爭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揮員活动的舞台，必須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指导战争如此，指导社会主义建設又何尝不如此。今年我国在社会

主义建設战綫上創造出来的許多“奇迹”，广大人民群众的許多发明創造，就是凭借了建筑在客观条件許可之上的舞台，充分發揮了广大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做的主观能动性，而演出来的許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因此我們不应当企求超越客观条件的許可限度，勉强去做那些現在还不能做到的事，而是要在客观条件許可的限度以内，依据客观規律，充分發揮人的主观能动性，把那些能够做到的事，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必須貫徹毛澤东同志历来提出的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我們必須認識，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冲天干劲，决不否認依据客观規律作科学分析的精神。依据客观規律作科学分析，正是把敢想、敢说、敢做的冲天干劲放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之上。既承認客观規律性，同时又承認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正是馬克思主义的特色。列宁說过：“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論不同，它精妙地結合着两种特点：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学冷静态度来分析客观情势与客观进化行程，另一方面是极坚决地承認群众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的意义，同时当然也承認那些善于探索并实现其与某些階級联系的个别人物、集团、組織和政党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的意义。”我們把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精妙地結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革命和建設事业的发展所向披靡，势如破竹。



从工人诗歌

看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

张光年



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这是多年来引起争论的老问题了。问题虽老，因为过去只是在一个小范围里争论，没有走群众路线，所以长期解决不了。有些人怕听到这个问题，一听人提起，马上搬出一个挡箭牌：根本问题是内容，而不在于形式，云云。这话听起来很革命，但是革命革得过火了，不但革掉了艺术传统的继承性，而且革掉了新诗按照群众的需要不断革新、不断发展的必要性。持有这类见解的同志们（我把故意宣传这种论调的胡风派除外），实际上是希望“五四”以来建立了革命功绩的、却主要是流行在知识分子圈子里的新诗，最好是原封不动；虽然这些同志明明知道，新诗和群众的关系，确实处得不好；在民族化、群众化的问题上，新诗本身的局限性还是不小的。

大跃进以来工农群众的新诗歌，以革命风格和民族风格的结合，向文艺界吹进了一股新鲜空气。现在的文艺界中，新月派、七月派以及艾青式的贵族诗人不那么多了。在诗歌方面，现在是革命诗人们当家。群众诗歌推动着新诗起变化；新诗也

欢迎着这种推动。这样，事情就比较好了。当然也还有少数同志怀疑新民歌在艺术形式上的局限性，他们害怕新民歌有朝一日将以五言、七言的歌谣体统一天下。我觉得这些同志没有看到群众诗歌正在迅速开拓诗学和美学的新领域，没有看到民族形式百花齐放的前景。一旦看到了，他们的见解是可能改变的。现在，新诗人中间，多数的意见是要向新民歌学习，从群众诗歌吸收一些好东西，促进新诗诗风的改变，从而创造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歌新形式。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我支持这个意见。但是我总觉得，我们对群众诗歌在艺术革新上的意义，还是估计不足。事实上，工农群众的诗歌，还应当加上战士们的诗歌，不但在内容上探索了劳动者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新天地（其中很多是新诗没有接触过的）；而且在艺术上也开始创造出民族诗歌多样化的新形式。多年来盼望的那种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新鲜活泼、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诗歌的新形式，由于群众的集体智慧的创造，我看是接近于解决了。

这决不是说，新诗人以后就没有事可干了。也决不是说，可以忽视在普及基础上不断提高的工作了。我是说，充分估计了



群众诗歌在艺术革新上已经达到的成就，进一步的艺术建设的工作就会顺利得多。

从我所读到的一部分工人诗歌，可以看出工人作者在艺术形式上摄取和消溶的能力是很强的。他们大量采用了各种民歌形式——歌谣、快板、曲艺等，同时吸收了旧诗和新诗的许多优点，创造了民族化、群众化、多样化的诗歌新形式。民歌也好，旧诗也好，新诗也好，一到工人群众的手中，都经过一定的改造，发生了推陈出新的变化。

曾经流行过这样一种论调：有人认为只有在农村里、田野里才有诗；至于在工业里面，那是找不到什么诗意的。有人干脆说：在城市和工厂里，生活本身就是散文的，你反正写不出什么诗来。在这类论调的影响下，有些作者对工业题材不那么喜爱了。其实，那完全是一种落后的偏见。在那些人的头脑里，似乎只有清风、明月、远山、红树这些远离尘世的东西，才是最富于诗意的。工人群众的诗歌，有力地驳斥了这种极端陈腐的美学观点。请看工人作者怎样从自己工厂的烟囱上找到了最新最美的诗意：

你是一支铁手臂，
高呼口号举上天；
你是一支大毛笔，
描画祖国好春天。

（上海纺织厂工人）

譬如说，在建筑工人的脚手架上，也有诗吗？有的！并且有很好的诗：

脚手架天梯，

一级高一级，
直插彩云头，
俯视千山低。

（上海建筑工程局 张明海）

或许有人怀疑，在装卸工人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诗意大概不多吧？错了！正是在装卸工人中间，出现了黄声孝这样优秀的作者，请看 he 怎样诗化了自己的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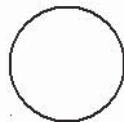
一条杠子一根绳，
一声号子一把劲，
一阵汗水一舱货，
一生劳动一生荣。

（湖北宜昌 黄声孝）

工人诗歌把工业战线上各行各业的劳动诗化了；他们从紧张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从周围的人们的英雄行动中，找到了动人的诗句；从而证明了：在革命激情、劳动激情最热烈的地方，也就是美的诗意最饱满、最强烈的地方。大跃进以来工农群众的诗歌，把千百年来陈陈相因的、人们在生活上艺术上那一套陈腐不堪的美学观念冲毁了。新民歌里那些最新最美的诗情，那些美的形象、美的语言和构思，都说明了我国工农群众的美感是高尚的而且丰富的。一个彻底地解放人们的个性、激发人们的美感的时代，已经来到了。

正是在这种崭新的美感趣味的支配下，工人群众多方面地寻求适合表达他们的壮美诗情的新形式。

工农作者喜欢采用在群众中流行已久的民间诗歌形式——歌谣、快板、曲艺等，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它們唱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它們本来是过去劳动人民自己創造出来的，所以至今受到劳动人民的欢迎。可是人們的生活改变了，思想感情改变了，美感、趣味也改变了，使得民歌在形式和风格上都发生很大的改变。我們說，现在群众写的民歌是新民歌，不仅因为它们的内容是崭新的，而且因为它们的形式和风格上也是新鮮的东西。

和农民的新民歌一样，工人的新民歌也經常采用歌謠体。所謂歌謠体，一般是五言或七言（当然也有三言、四言，也有八、九字、十来字一句的，也有参差不齐的长短句），大体上四句一段（当然也不尽如此），类似过去的山歌、秧歌或民間小調。可是，新歌謠内容是新的，运用了新鮮的語言和語彙，使得歌謠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就象刚才引用的装卸工人黃声孝的那首小詩吧，你还能說它是山歌、秧歌或小調嗎？对于某些沿用了旧歌謠比兴手法的新民歌，也不能这样說。例如上海一位工人写的：

什么藤結什么瓜，
什么树开什么花，
什么时代唱什么歌，
什么阶级說什么話。

你还能說它是秧歌小調嗎？这首詩的内容，特别是最后两句，就有力地駁斥了用固定的眼光看待民間形式的种种說法。

大字报，大字报，
又象星星又象炮。

星星放光亮閃閃，
亮閃閃的紅光是那大字报。

这是上海工人王发义的詩句。我只引用了这詩的第一段。这首詩，很象是快板体。工人們很喜欢說快板。农民和战士也喜欢快板詩。这种民間的朗誦体，看来更自由、更奔放一些。它的句子和段落都可长可短，既用来抒情，也可說故事，写人物，它的发展前途是广闊的。群众的快板詩，就拿这个例子來說，很接近于我們所說的新詩。它本身就是一种群众化的新詩。它的节奏鮮明、音韵自然、明白如話和适于当众朗誦的优点，很值得新詩人研究揣摩，作为改进新詩詩风的参考。

工农群众的新民歌中間，也經常采用各种曲艺形式。这种形式便于說唱和表演，在晚会节目中很受欢迎。新曲艺多半是篇幅較长，音乐性、戏剧性較强的叙事詩，大鼓、单弦、快書、墜子等是常用的形式；山东快書更是工人晚会中經常用来歌唱群众中的新英雄人物的艺术手段。对于工人的新曲艺，需要专门地加以研究。在这方面，他們的艺术革新的勇气也是不小的。在旧曲艺的基础上，群众創造了一种适于歌唱新人新事的新曲艺，现在已成为新民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工人詩歌也从旧詩里面吸收一些东西嗎？是的，他們从旧詩里吸收一些东西，并且做出很有旧詩风味的新詩来。不久以前“人民日报”上，在郑重宣布超額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鋼这个全民大喜事的同时，就



登了这样一首工人诗歌：

冲天烈火照星空，
疑是东方旭日升。
熊熊炉火放异彩，
人面钢花相映红。

（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 于世河）

作者写的是炼钢旁夜战的情景，大概很多人有共同的感受。这首诗基本上采取了旧诗的手法，虽然并不拘守旧诗的格律（第三句失粘）。末一句显然是唐人旧句的翻新，却反映出了炼钢炉旁的真情实感。

我不想特别赞扬这种旧句翻新的手法。现在看看另外一个例子：

钢水红似火，
能把太阳锁。
霞光冲上天，
顶住日不落。

（湖北大冶钢厂，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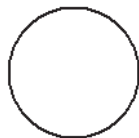
同样的题材，同样的豪情，同样看得出旧诗的影响；这首诗却更加口语化，读起来更加爽朗而有力。说是钢水的火光把太阳锁住了，因此那里有了不落的太阳，这个意思是新鲜的。总之，这是新诗，你不能说它是旧诗。

我国的古典诗词，有悠久的、光辉的传统，至今在人民中间保持着深远的影响。过去有人认为新诗只能向外国的诗歌学习；顶多可以从民歌学些东西；至于古典诗词，他们认为是“封建形式”，没有什么生命力了，不值得学习。现在大家可以看出这种论调是多么幼稚！为什么在我们

的革命老干部中间，有些同志喜欢写写旧体诗词，难道这些同志是为了附庸风雅吗？当然不是。这些同志有丰富的革命感情，他们要表达自己的感情。旧诗词格律较严，要熟练地掌握这种形式，本来是困难一些。可是许多年来，有些人把新诗的形式和语法搞得非常欧化，使人更加摸不着头脑；而另外有些诗，懂是好懂了，可是淡而无味，它们也帮着搞坏了新诗的招牌。好的新诗是有的，可惜被以上两种货色所淹没了。因此有些爱好诗歌的老干部宁肯利用他们一向熟悉的旧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新感情，他们觉得，把丰富的内容压缩在短小而严整的诗句中，咀嚼起来更有味道一些。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突破了、改造了旧形式，使旧形式获得了新生命。更不必说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把巨大的革命内容压缩到那样严整的艺术结晶中，它们通体闪光，辐射出动人心魄的射线来。

工农群众充分掌握我国民间诗歌、特别是古典诗歌的丰富遗产，以至于消化它，当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可是，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创造生动活泼的诗歌新形式，这不只是一个理想，而是正在变成现实了；尽管这还是一个开始。

工人的诗歌，采用自由诗形式的也不少。有的同志看到这个现象，大受鼓舞，从而得出结论：可见新诗还是有前途的。谁说新诗没有前途呢？新诗很有前途，问题是它必须按照群众的需要加以改造。果然，新诗在工人作者的手中，也就不客气



地加以改造了。随便节引两首吧：

用老入路的歌喉，
歌唱大跃进的春天。
他那指挥棒的姿势，
仍象在战火中跃马挥鞭。

(北京石景山发电厂 靳开攀)

这诗写的是该厂领导干部合唱团在一个晚会上演唱时候的情景。我们似乎看到舞台上一排老干部涨红了脖子在演唱大跃进的新歌；似乎看到指挥者粗犷的、一本正经的神态；也似乎看到台下工人们怎样压住了自己的喜笑和欢呼，屏息倾听着领导干部们不很熟练的表演。

炮声刚响，硝烟刚散，
我立刻抱起电缆，
为赶上英国，
誓向大自然宣战。

……………

使劲！顶稳！
看准！猛鑽！
要用这支钢铁的笔，
写下矿工的忠心赤胆。

(京西城子煤矿 周隆濂)

这首诗的题目是“矿工战歌”，它的确写出了矿工们在地层下面英勇战斗、为祖国献身的崇高意志。

工人写的还有一类新诗，和新民歌很少差别；也有少数新诗，刻意模仿知识分子的腔调；但是前面所举的两首，有较普遍的普遍性。它们的特点何在呢？撇开内容，单就语言和形式上说，它们不但和新月派

的欧化诗、和七月派的自由诗大不相同，就是和常见的知识分子的新诗比较起来，也可以看出以下的特点，那就是：诗句的口语化，宜于朗诵，一听就懂；语言干净利落，很少拖泥带水的句子和大串形容词；节奏鲜明；音调铿锵；其结果就是新诗的群众化和民族化，就是新诗的推陈出新。

工人作者们采用新诗的形式写作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要改造新诗，正象他们没有特为想到要改造民歌一样。可是工人的诗歌活动是一种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作者为谁写作、为什么写作，目的性是鲜明的。大部分新诗是为了登在大字报上，或为了当众朗诵，都是有所为而作的。新诗要经得起群众的考验，经得起朗诵会上的考验，那就不能不考虑到群众的趣味与好尚。工人作者本人的趣味与好尚和他的读者、听众的趣味与好尚（他们本来是一致的），决定了这些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的特点。这一条经验很重要。要是新诗根本想不到群众中去过关，要是新诗人根本不想写为了朗诵、为了歌唱的诗，而只愿意写纸面上的、眼皮上的诗，焉得不使新诗本身的局限性越来越大？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它的对立面。民歌、曲艺、旧诗词这些旧形式，一经掌握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劳动人民的手中，可以经过推陈出新而变成新形式。新月派、七月派的欧化诗，曾经是很时髦的新形式，但是因为它们脱离了群众，曾几何时，就变成和新时代格格不入的旧形式了。这一点，很值得



我們过細地想一想。

从工人詩歌可以看出，新民歌和新詩，这两种基本的形式，正在互相吸收，互相融化；同时又相輔相成地发展着。从这里，大体上可以看到我国新詩歌的将来。人們精神生活的需要是多样化的。社会越进步，人們的文化生活越丰富。艺术形式今后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变化多端；不是越来越简单，而是越来越多采。新詩歌在艺术形式上的总的趋向，是民族化的，群众化的，又是多样化的。

有的同志担心新民歌的“发展前途”，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們沒有看到，新民歌本身就是詩歌領域的新发展，是地平線上霞光初閃的新事物，它的发展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新民歌本身就是多样化的統一体，它采用了民間的歌謠、快板以及形形色色的曲艺形式，也吸收了旧詩詞和新詩歌的某些表现手法。这一切，合一爐而冶之，冶出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新事物。歌謠体的小詩，在很远的将来也将是发展不衰的。而經過改造的快板詩和某些曲艺形式，从中必然会发展出大量壮丽的叙事詩，創造出各色各样新时代的艺术典型。既然旧民歌能够創造出包罗万象的民族史詩（我国各兄弟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詩）和动人心魄的英雄故事詩（例如旧曲艺里面的水滸英雄故事詩），新民歌为什么不能够呢？在新曲艺的优秀作品中，已經可以看出一些苗头了。

有的同志担心新民歌在艺术形式上的

“局限性”，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工农兵群众的新民歌，从题材上說，已經接触到当前社会生活的一切重要領域；从思想内容上說，表现了人們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的崇高而丰富的心灵活动；从艺术上說，是多种多样、多种风格的百花齐放，用五彩繽紛的图画和益人神智的佳句丰富了我們的生活；从社会作用上說，它是群众自己的东西，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贴近人民，因此在人民群众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长处，恰好是值得我們認真学习的；因为从这些长处，不难相对地看到新詩的某些弱点，包括新詩在艺术形式上的局限性。当然，各种文学体裁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用几行民謠短句来塑造一个复杂的性格，描写复杂的場面和复杂的心理过程，那是办不到的。但是誰会对它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有的同志担心新民歌一旦用五言、七言的歌謠体統一天下，把新詩放逐了。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新民歌不尽是五言、七言，也不尽是歌謠体。新民歌今后当然要大大发展，不断提高；但是它乐于同新詩和平相处，自由竞赛，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只要新詩不是貌新而实旧，貌中而实西，貌高而实低，因此同群众貌合而神离；只要新詩肯到群众中去扎根，那就誰也不会放逐它，反而是不胜欢迎之至。必須看到，新詩正在变化中。工人作者們的新詩，替新詩打开了新門路。那样民族化、群众化的新詩，革命的新詩人們也能



写得出来。过去写过；现在逐渐多起来了。大跃进以来，许多有远见的新诗人深入群众，和群众互相唱和，互相学习。许多诗人正在改进自己的诗风，开始收到良好的效果。诗人们正在讨论如何使新诗更加适合时代和群众的需要，如何开一代的新诗风；正在讨论如何更好地学习新民歌，学习古典诗词，也从外国诗歌中吸收有用的东西，从而促进诗歌的民族形式的发展。虽然在报章杂志上，那些潦草的、不修边幅的新诗随时可以看到，但是不少诗人在命意遣辞方面，肯多化些功夫了，这些同志正在帮助挽回新诗的好名声。所有这些，都是积极的现象。群众唾弃那些远离群众的新诗，正是帮助那些联系群众的新诗健康地成长起来。

我们说群众的诗歌促进了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解决，这不等于说，凡是群众的东西都是好的，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也不等于说，群众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已经有了一套完备的经验。但是群众

诗歌中的优秀作品，确实开辟了诗歌艺术的新天地，这是决不可以过低估计的。“五四”以来的新诗歌，功绩是无可怀疑的；建国以来，也出现了不少出色的作品；可是总的说来，我们新诗歌艺术的建设工作还是比较薄弱的。一篇既成、传诵天下的佳作还是不多。在诗歌中创造壮美的、使人难以忘怀的英雄形象，还有待于我们的继续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群众创作已经达到的新成就，这些创作中提供的新经验，就特别地感到宝贵。革命的新诗人们，最好是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关于遗产的知识，运用丰富的创作经验（这两者都是群众作者所缺乏的），细心地研究群众在艺术革新上所已经达到的成就，加以总结提高；并且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做出新的榜样，把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解决得更好，转过来推动群众诗歌的发展与提高。我看，我国诗人们肯定能够担当这一光荣的工作。

我的意见可能有片面性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指正。

写
诗



古
元



丰富多彩

郭小川

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应声虫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惯常的诬蔑和曲解之一，就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是单调的、千篇一律的、贫乏的。这其实早已是滥调了。现在杜勒斯一流的帝国主义者在攻击我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候，又搬出了这种滥调。

照他们看起来，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生活是决不会丰富多彩的，只有在他们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才会有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的确，就一个方面说来，资本主义社会要比社会主义社会复杂得多，花样多得多。在那里，一方面有荒淫无耻，一方面有辛苦艰难的劳动和斗争；在那里，有为剥削阶级准备的形形色色的物质享乐，有为被剥削阶级准备的形形色色的悲惨的命运；在那里，有卖淫，赌博，投机，欺诈，抢劫，暗杀等等。这一切由剥削制度产生出来的东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能再存在了。欣赏这一切东西的人当然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单调无味。

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活的

另一面却是真正的单调和贫乏的。资本主义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也有过繁荣发展的时期，但曾几何时，就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造出了大量的物质产品，但是这些由劳动人民的血汗所造成的产品，几乎全为少数大亨所独占，绝大多数劳动者只能过着赤贫的、单调的生活。凡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地方，到处有富人的欢笑和穷人的血泪，到处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这难道不是千篇一律么？而这种千篇一律只是有利于极少数人而为绝大多数人所憎恶和反对的。在精神生活方面，资产阶级统治者，特别在它的没落时期，是极端单调贫乏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是敌对的，对于艺术与诗歌就是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有闲人士，别出心裁地跳什么阿飞舞，阿飞舞玩腻了，也还会发明什么“呼拉圈舞”之类。但是这套把戏，连同那里的失业、犯罪、堕落等等，只能说明那种生活方式的单调。剥削人的人自己越来越退化了。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只不过是一个精神极端空虚的吝啬鬼。契可夫在“万尼亚舅舅”里这样地描写那个教授妻子：“她确是很美，可是……她什么也不做，除了吃、睡、游荡，拿她的美来迷人——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她没有一点责任和义务，只是让别人替她工作……。”

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剥削制度，就使得社会中间再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区别，于是就能够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做到使每一个人都能丰衣足食。如果认为



人人都丰衣足食是一种“单调”，那么这种“单调”正是几千年来一切被剥削的人民的理想。但是虽然如此，劳动人民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后，决不会满足于人人丰衣足食的水平。拿我国的情形来说，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不但建立了许多中国从来没有的新式大企业，而且又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洋法的、土法的、洋土结合的中小企业，同时也没有忽略了我国带有各种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的传统的手工艺品的生产，而且有些已经几乎失传的手工艺，在最近几年来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了。这难道不是真正的丰富多采的景象的一种开端么？现在我国的产品确实还不够丰富，但是对于已经摆脱了在社会中那种极端贫困状态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他们完全确信，我国的社会产品一定会越来越丰富，不要太长的时间就会比任何西方国家的产品更丰富，关于这一点，可以完全不劳西方的资产阶级老爷们费心。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丰富产品不会为少数人独占，而是供给全社会的成员享用的。随着社会产品越来越丰富，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也自然越来越丰富。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人们的文化生活也就必然会非常地丰富多采。时至今日，我国的群众性的文艺创作运动已经如此蓬蓬勃勃，在我国整个文艺艺术领域，都已真正地呈现了百花齐放的景色。在一往直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这种富丽的情景显然不会有任何的减色，而只能是有增无已。

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中，相同和不同，单纯和丰富，一致和多采是互相

对立而又统一的。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的需要总是大体相同而又各有不同的”。社会产品愈丰富，就愈可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世界上哪会有那种死脑筋的蠢人硬逼着人们“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子”呢？“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这是共产主义的一致方面。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每个人的个性却正好可以得到充分发展，每个人的天才正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施展，因而又是丰富多采的。可以想见，将来产品的品种只会越来越多，食品会越来越有味、多样，房屋、衣服会越来越舒适、美观，科学文化的成就会越来越多、越奇妙，文学艺术越来越万紫千红，生活的内容越来越有趣和充满了生机。

让敌人去胡说八道吧，胡说八道的人只会暴露他们自己的骗子的嘴脸。至于我们自己，从来也不会对单调贫乏、千篇一律发生兴趣。让我们的产品及品种更多，花样更翻新吧！让我们的各项工作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中创造更丰富的经验吧！让我们的文学艺术在为社会主义、为政治服务的大原则下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吧！让一切都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变得更丰富多采吧！这就是我们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并不久远的将来，一定要在“一穷二白”的大地上，画出最美最新的图画，写出最新最美的诗篇。诬蔑和嘲笑我们的敌人，你们且目不转睛地瞧着吧！单调、贫乏、千篇一律都是属于你们的，我们正在摆脱你们所留给我们的遗产，大踏步地走向你们的反面。



一个小型钢铁联合企业的诞生

閻 明 潤

人民公社的土洋結合的小型鋼鐵联合企业的出現，标志着“小土群”鋼鐵生产方針的巨大胜利，显示了“小土群”鋼鐵生产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和提高，这是全民大办鋼鐵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对于促进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将起巨大的作用。

对于“小土群”必須向土洋結合的小型鋼鐵联合企业发展，开始的时候，我們是缺乏認識的。后来，实际情况使我們逐渐認識了这个发展的必然性。

拿湖南攸县的情形来看。攸县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中旬止，就有一千多个爐子出鉄，其中有六十多座高产的爐子。所有这些爐子在一九五八年完成全县鋼鐵生产任务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一千多个爐子中，絕大多数都是土爐子，它們还存在着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这些土爐子的分布比較分散，从利用矿砂、燃料到出鉄，都有很多不方便之处，特别是与炼鋼缺乏必要的联系；同时，各个生产环节分开，安排劳动力也感到困难；此外，在管理和經濟核算上也存在着不少問題。在今后鋼鐵生产的繼續跃进中，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使“小土群”鋼鐵生产得到巩固

和提高，是不能不考虑的。

由于生产的发展，技术的革新，特别是工具的改革，对于鋼鐵的需要就更增加了。我們粗略地算了一笔賬：如果攸县明年要生产粮食二十亿斤，要大大发展經濟作物，要完成飼养一百二十万头生猪、八百万只家禽的計劃，就需要改制十九万四千件工具。在攸县还打算搞一个农业工厂化的試点，再加上工业和服务性行业以及电话网、广播网方面所需用的鋼鐵，基本建設的鋼筋等，估計一九五九年要用鋼材一万吨左右。这些鋼材从哪里来呢？肯定不能完全向上級要。所以，我們打算除了骨干的工农业机械設備以外，其余一律要依靠自己解决，同时，还要向国家上交大批鋼材。这样，鋼鐵生产如果还停留在原来“小土群”的水平上，是难以滿足日益增长的需要。

我們研究了以上两种情况，肯定“小土群”鋼鐵生产必須巩固和提高。同时从过去这一阶段鋼鐵生产方面已經出現的一些新事物来看，也証明了它能够巩固和提高。例如，在前一阶段大炼鋼鐵中出現的土洋結合的高产爐子，它們用水力或者机械动力鼓风，多数安上了热风設備，爐型結構也比



較固定，这种爐子就比原来的土爐大大节省劳力，并且提高效率。我們总结了这些經驗，开始認識到必須土洋結合，并且尽可能把原来分散进行的炼鉄、炼鋼、軋制鋼材等各种生产过程联系起来，組成联合生产，才能够进一步提高鋼鉄生产。

正当我們从这个方向考虑的时候，中央冶金工业部的一些同志来到了攸县，他們向我們提出，“小土群”鋼鉄生产的发展方向，是土洋結合的小型鋼鉄联合企业。他們还向我們詳細地介绍了这种联合企业的內容、特点和优点。这就更加启发了我們的思想，鼓舞了我們的信心。

土洋結合的小型鋼鉄联合企业，把采矿、采集燃料、炼鉄、炼鋼、軋鋼和机械加工等等生产过程連接起来，并且尽可能用动力和机械設備代替一部分手工劳动，这样就便于采用新技术，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提高产品的质量。例如，把炼鉄、炼鋼連接在一起，就可以采用热装炼鋼的技术代替冷装炼鋼的技术；把炼鋼、鍛鋼、軋鋼連接在一起，就有利于增加土鋼和鋼材的品种，提高鍛品的质量；把采煤、炼焦、炼鉄甚至制造水泥連接在一起，就有利于节约燃料和劳动力，以及便于综合利用資源等等。只有兴办土洋結合的小型鋼鉄联合企业，才能使“小土群”逐步巩固和发展，使土法逐步提高，使原有的分散的生产过程連接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鋼鉄生产的体系，从而在农村中建立起重工业骨干，为实现人民公社的工业化和农

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准备好物質条件。

在明确了以上的認識以后，我們选择了条件适合的酒埠江人民公社，試建了一个土洋結合的小型鋼鉄联合企业。

在开始建立这个联合企业的时候，有些人是有顧虑的，他們認為基本建設物資困难，技术人員缺乏，不相信能在短期内建成投入生产。可是事实恰恰相反，經過宣传动员，将兴办联合企业的意义告訴群众以后，大家真是欢声雷动，干劲冲天，都说：“天天吃苦炼鋼鉄，这下要享鋼鉄的福了。”“共产党真英明，看得远做得到，这下子我們亲眼看到炼鋼的好处了。”六十立方公尺的木材，五万块砖，一万八千付檐皮，不到几天就弄齐了。本来預計建成这个企业需要五千个工，結果用三百个劳动力，只五天时间就建成了，比原来計劃的时间大大提前了。事实有力地批判了某些人的保守思想。

这个土洋結合的小型联合企业，是以酒埠江人民公社的鋼鉄重点地区酒埠江鉄厂的原有設備为基础，增設了小型軋鋼設備、机械加工設備以及相应的动力設備建成的。新增設備的投資最多不过二万元，可是联合企业建成以后，每年就可以产鉄一万二千万吨，产鋼六千四百吨，鋼材(包括方鋼、扁鋼、鋼条、鋼筋、鋼絲、洋釘等)五千吨，并且还可以产焦炭二万吨，水泥一万五千万吨，机械加工鑄造二百吨，木材加工五百立方公尺。建成这个联合企业，可以节省劳动力五千五百个，即节省了全公



社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个联合企业，一年的利润有二百五十六万六千元，相当于全公社一九五八年农副业的总收入。这个联合企业今后的发展，将逐步增加机械加工能力和翻砂铸造能力，制造小马达、电气深耕工具、联合收割机等，这样，就一定会给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打下更加有力的基础。同时，它还可以为公社培养出大批的技术人员。

我们通过试建这个土洋结合的小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初步经验，并且根据中央关于“小土群”的定点、定型、定组、定员、

定领导的指示，对今后全县钢铁生产的发展作了统筹安排。在现有的一千多个土爐中，我们打算选择五、六个优秀爐型，逐步改组成“土洋结合”的爐型，集中利用人力和物力资源，改善经营管理，以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钢铁生产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在这些优秀的爐群中，再选择八、九个条件较好的，建成土洋结合的小型钢铁联合企业，以便巩固和提高“小土群”的钢铁生产。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中共湖南攸县县委第一书记)

农民怎样议论按劳分配

王 录

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在农村人民公社里，已经普遍地实行起来了。虽然各地在做法上有许多不同，但毫无例外地都得到广大社员的拥护，到处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农民中比较普遍的舆论是：

“永世不用再愁吃饭这一回事了。”

“多少年来奔的就是穿衣吃饭，现在一块石头落了地。”

“好好干吧，好光景还在后头哩！”

可以看出，实行粮食供给制或者伙食供给制，确是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

实现了他们多少年来的愿望。

那末，是不是广大农民只是满足于粮食或者伙食的供给呢？并不是。从农民群众的反映来看，他们是既要求公社供给伙食以至其他基本生活资料，也要求发工资。他们说：

“搞供给制，生活有靠头；加上工资制，手里有活头。”

“供给制对人口多的农户好处多，工资制对劳力多的农户好处多，大家都高兴。”

农民不仅热烈地赞扬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而且对实行中的一些



具体問題也有不少議論。

首先是在分配給社員的总額当中，如何确定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的适当比例的問題。据我們調查，在目前情況下，如果供給部分过大，收入减少或者消費水平降低的农户就会多一些。这些农户多数是劳动力多、劳动力强、人口少的貧农和下中农，他們有些还是具有特殊技术的人和生产能手。富裕中农中虽然也有少数由于过去家庭副业多或劳动力多而减少收入，但是他們当中多数人因为劳动力多而人口也多，所以增加了收入。

那些收入减少或者收入增加較少的貧农、下中农，虽然很少有人斤斤計較，仍旧照样地埋头苦干，沒有怨言；可是，在一般农民中間，特别是在那些人口多、劳动力少因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农民中間，却表露出一些不安。他們說：

“咱們生活提高了，也不該叫人家比以前差。”

“不能亏了那些好劳动的人。”

由此可見，人們是不願意叫这些人减少收入的。根据各个公社生产发展的不同情况，适当地确定工資和供給的比例，以便做到既能增加公社的积累，又能保証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增加收入，百分之十的社員不减少收入，是目前分配当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問題。

其次，一些年岁較大的农民，对于公社規定工資等級时，对青壮年照顧不够，而把老弱和兒童的工資定得稍高的做法，

也有議論。如在河南襄城县双庙人民公社里，社員說：

“那些年青力壮的，不管男的女的，干起活来象老虎一样，衣裳鞋子費得多；也不能叫他們穿得和咱們一样，讓他們穿上綫袄、綫褲，干起活来也精神；他們学习文化，要买本子、鋼笔，花費也比別人多，应当多发給他們点工資。”

“別看他們工資多点，花起来不淮够用，老头老婆們发的少些，真是花不了。”

在这里，一方面說明，这些老年人是怎样体贴和疼爱那些忘我劳动的兒女們；另一方面，也說明目前农村公社在制定工資标准时，根据劳动的情况划分不同的等級，在各等級之間保持一定的差額，是必要的。

最后，是在一个公社之內如何解决原来各农业社在分配上的統一和差别的問題。原来的几个农业社在秋收前合并成了一个人民公社，这些农业社，有的办得好，生产有很大跃进，有的生产搞得較差。在合并以后，很多生产好的农业社发揚了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自願地拿出成千上万的現金，拿出自己最心爱的胶皮車和牛馬，并且調出成百的劳动力，不要任何報酬地去帮助生产困难或者受了自然灾害的农业社。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应当大大提倡。但是，有些地方把一些原来由于工作做得好而生产跃进很显著的农业社，和原来由于工作做得不好而生产很少增长的农业社合并成一个公社以后，沒有很好照



願这种不同情况，把这些社的收入都集中起来，統一拉平，进行分配。結果就使生产好的社有不少社員减少了收入，而生产不好的社却有很多社員的收入成倍地增长。人們对于这种不加区别地給予同等的工資和供給，是有抵触情緒的。双庙公社一位老农的話，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群众的意見：

“叫我看，生产好的，供給、工資都要高一点，生产差的，就要低一点。这样办，生产差的往前撞得就快了，生产好的干劲也就更足，社会主义建設也会快一点！”

那些生产較差的村的农民怎样表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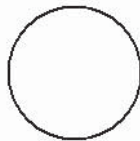
呢？

一些有觉悟的貧农下中农說：“咱們村生产搞得不如人家，一样領工資不算合理，可要好好干哪！再干不好，对不起全公社。”这就証明，这种办法在一部分群众中間是起了好作用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他們說：“在一个公社里，干好干坏都一样。”这又証明，这种办法在实际上市助长了一部分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对生产的发展是不利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一九五八年秋前的农业生产是以原有各小社为单位进行的，而各个单位之間在生产方面有好好



劳动和休息 (科学小品)



树 則

党中央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提出必須保証每天睡眠八小时，吃飯、休息四小时，共十二小时，这是完全适合于目前生产情况和一般健康需要的提法。大家都知道，要劳动好，也要休息好，休息好正是为了劳动得更好。我們在这里从生理科学上談一談劳动和休息的关系。

劳动、休息和吃飯都为生命所必需。劳动是为了发展生产，滿足生活需要；吃飯是为了补充劳动所消耗的各种营养素和維持生命現象；休息是为了战胜劳动所产生的疲劳。

什么叫做疲劳呢？因持續劳动而引起的劳动能力的自然下降叫做疲劳。为什么持續劳动到一定的限度，劳动能力会自然下降呢？这是由于人

的肌体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所引起的。

人在劳动的时候，消耗着来自食物的营养素特别是醣类（即淀粉和糖等），和来自空气中的氧气。劳动强度愈大，消耗得也愈多。在劳动中，肌肉要进行紧张的活动。同时，在肌肉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化学变化，其中主要的变化就是醣分解为乳酸，乳酸再和氧結合变为二氧化碳和水，通过血液循环，排出体外。人在安靜的时候，每分鐘只消耗二百到二百五十毫升的氧气；在劳动的时候，消耗的氧气量可以增加几倍甚至十几倍。但是血液供应肌肉的氧气是有一定限度的，劳动紧张的时候，氧气的供应不能完全滿足肌肉的需要。这样，在肌肉里面，那些分解的产物象



坏，人们在觉悟程度上有高有低，所以公社在进行对社员的分配时，在各个单位之间采取基本平衡而又有差别的做法是比较合适的。基本平衡主要是基本的供给（粮食、食油、盐等）和基本工资实行全公社统一的标准。又有差别，则是在基本供给之外，对生产好的单位，在细粮、食油、猪肉等物资供应上加以照顾；在基本工资之外，再给予一定数量的奖励工资。今年许多地方的公社是采取这个原则进行分配的。这样做，绝大多数农民都感到公平合理，对那些认为“不管干好干坏都一样”的农民，也是一个教育，有利于政治工作的进行，

也有利于生产运动的开展。随着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产品的增加，农民觉悟的提高，各单位之间生产水平高低悬殊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样，也就可以自然而然地逐步消除这种差别了。

在党中央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人民公社在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应当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制度，并且指出，这种分配制度的基本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党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方针，显然是符合于当前广大农民的要求和想法的。

乳酸等，就愈积愈多，蓄积到一定程度，肌肉的活动力量就开始减弱。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休息，那些分解的产物才能消散，肌肉的能力才能重新恢复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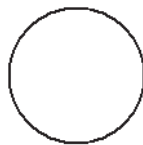
氧气和来自食物的各种营养素是由血液输送的。人在劳动的时候，肌肉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人在安静的时候，心脏每分钟输出的血量大约是四公升，劳动的时候可以增加到十几公升、二十公升，甚至更多。心脏为了把这样大量的血液输送到血管里去，不仅要增加搏动的次数，更主要的是要增加心脏搏动的强度。正如四肢的肌肉持续活动可以引起四肢肌肉的疲劳一样，心脏持续大力搏动也可以引起心脏肌肉的疲劳。心脏疲劳的表现是搏动次数一分钟比一分钟增加，而每次搏动的力量一次比一次减弱。其结果是由心脏输出的血量愈来愈不能维持劳动的需要。必须经过休息，减轻心脏的负担，心脏的力量才能重新恢复正常。

劳动的过程是很复杂的，劳动不只是一条肌肉或一个肢体单独的活动，而是全身各部分包括

内脏在内的协同动作的结果，这种协同动作是由神经中枢来调节、来指挥的。在紧张的劳动过程中，神经中枢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神经中枢的持续兴奋，可以引起神经中枢的疲劳。其表现是调节失当，指挥不灵。因而劳动的效果就会减退。必须经过休息，神经中枢的调节能力、指挥能力、思考能力才能重新恢复正常。

人在睡眠的时候，中枢神经系统和肌体各器官的活动都显著减少，全身肌肉松弛下来，能量的消耗也减少了，所以睡眠充足对于体力脑力的恢复，关系特别重大。八小时的睡眠可以给我们带来整天的精神饱满、体力充盈，使我们的劳动能够收到美满的效果。

认为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完全不能有伸缩性，那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忽视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的一定限度，也是不对的。劳动必须有节奏地进行，劳动与休息必须有适当的交替。这是打不破的客观自然规律。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个规律，为我们的生产劳动服务。



照妖鏡下显原形

——铁托集团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说明了什么？

李 亚

铁托集团虽然还打着所谓“积极共处”、“非集团”、“和平中立”政策等等旗号，并且利用各种机会招搖撞騙，但是它的真实面貌已经愈来愈掩藏不住了。不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且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不难从铁托集团的一系列言行中看出，它实际上只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一种改头换面的工具。

我们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从一九五八年八月以来铁托集团在台湾海峡地区斗争中的言行。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帮腔的铁托集团，在这场斗争中，明明白白地暴露了它的原形。

在这场斗争中，铁托集团站在哪一边，从一开始就是很明显的。八月底以来，南斯拉夫报刊对于台湾海峡地区的形势，大量地发表了美、英西方通讯社的电讯和报道，刊登了不少炫耀美蒋军事威力的照片，并且还刊登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战争挑衅的声明和谈话。例如，南斯拉夫“战斗报”早在八月二十四日就刊登了西方通讯社所报道的杜勒斯谈话，这个谈话极其恶毒地诬蔑我国福建前线解放军对于蒋军的惩罚性打击。尤其荒谬的

是，铁托集团的报刊竟然把久已被中国人民唾弃了的台湾国民党集团当成一个国家看待。从八月二十四日起，铁托集团的报刊就不断登载所谓

“蒋介石政府国防部”的公报。人们已经很难找出铁托集团的报刊同美国垄断资本的报刊究竟有多少区别。

除了这种为美国侵略者张目的报道以外，铁托集团的报刊还发表了不少关于台湾海峡地区斗争形势的评论和文章。从这些奇文中，可以进一步认识铁托集团是一种什么货色。

铁托集团报刊的许多评论，都是同美国反动报刊互相唱和的。它们诬蔑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斗争，是制造“紧张局势”，使国际关系“尖锐化”。八月二十六日，斯洛文尼亚“信使报”在评论“远东局势尖锐化”的时候写道：中国“是故意选择这个时机的。中国的意图就是要使世界那部分地区的关系尖锐化”。这张报纸在九月九日更露骨地写道：“这个局势的尖锐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造成的”，“必须谴责每一个使局势尖锐化的行动”，“中国的行动是对和平的威胁”。请看，铁托集团就是这样不顾廉耻地站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场上来反对人民中国！

按照铁托集团的观点，美国直接用武力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武装



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这一切都不是造成紧张局势的原因，都不是对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威胁；反而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在“制造紧张局势”！

按照同样的逻辑，那么，当埃及政府宣布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印尼政府要求收复西伊里安，黎巴嫩人民反对夏蒙，伊拉克人民推翻费萨尔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制造紧张局势”了！

铁托集团为了混淆是非，为帝国主义的战争侵略政策掩飾罪过，还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解放自己祖国领土的斗争，說成是“世界分裂为两大敌对的军事政治集团”和所謂“集团政策”的结果。照九月四日南斯拉夫“外交公报”的說法，金門前綫的隆隆炮声，正在使得“集团的冲突又导致危险”。

铁托集团的这种謬論，真是太无耻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英勇斗争，已經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中国人民从自己的斗争中确实知道有一个“集团”，那就是处心积虑、企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这个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早在社会主义陣营誕生以前的好多年，就已經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了許多坏事。它們到处进行侵略战争，到处制造紧张局势，并不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社会主义陣营，更不是什么“集团政策”的结果。中国人民对于台湾问题的正义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統一祖国的神圣事业。是的，所有社会主义陣营各国都对

中国人民的这一正义斗争，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也都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一正义斗争，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同铁托集团所說的“集团政策”根本是风馬牛不相及的。铁托集团公然以什么反对“集团政策”来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来反对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和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只不过说明了铁托集团并不是什么“超集团”的、“非集团”的，而是頑固地站在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方面，頑固地敌視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

铁托集团同美国侵略者一呼一应，在誣蔑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时候，竭力把自己装成是十分关心和平的样子。八月二十六日斯洛文尼亚“信使报”的評論“新的温床”一文中就写道：“十分明显，世界需要和平，更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福摩薩。”九月七日南斯拉夫“解放报”写道：“人們有权发問：一个中国沿海島屿金門的命运是否值得把千百万人投入战争灾祸中去？为了金門是否要世界卷入战争？”九月九日該报竟公开警告中国“不要进行可能燃烧全世界的玩火”。这些无耻謬言，也完全是跟杜勒斯学舌的。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他們的侵略阴谋，总是叫喊什么“维护和平”呀，“放弃使用武力”呀，而实际上則是时刻記住要实现它的侵略目的。铁托集团正是这一套貨色的推銷員，他們不要求侵略



者停止侵略，反而威吓被侵略者要乖乖地接受侵略；不要求放火者停止放火，反而威吓被害者，不得抵抗，不应该进行灭火的斗争，否则，就要定下“破坏和平”之罪。原来铁托集团叫嚣的“和平”，就是为侵略者张目的“和平”，为战争贩子张目的“和平”！

铁托集团的报刊还摆出一副传教士的面孔，为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利益说教，大谈什么“和解”和“让步”。九月十日“政治报”写道：“不论中国和美国以及全世界，都只能从互相让步和谅解中得到好处，而进一步加剧局势不可能使任何人得到好处。”九月十七日“战斗报”也写道：“正是事件的危险发展，责令双方表现出最大可能的善良愿望，以便避免进一步的复杂化。”铁托集团所高唱的“和解”和“容忍”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八月二十六日斯洛文尼亚“信使报”就做了回答，它说：“如果大陆发动攻击，特别是这种行动意味着军队登陆的前奏，美国是不会容忍的。”九月三日的“政治报”也写道：“如果中国方面继续施加军事压力，谁也不能说将会发生些什么。”按照铁托集团的喉舌的这些说法，对于美国的武装挑衅，中国人民只能“容忍”，决不能反抗；否则，美国老爷就不能容忍了。中国人民如果胆敢“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就要大祸临头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铁托集团对美帝国主义如此忠心耿耿，以致忘记了化装，在说话的时候直接用起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威胁中国人民的腔调来

了。试问：美国会不会“容忍”，铁托集团的评论家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呢？是华盛顿的什么人授权他们发表这样的谈话么？

铁托集团的报刊秉承主子的意旨，还竭力鼓吹由联合国对台湾问题进行所谓“调解”。九月八日的萨格勒布“自由之家”报写道：“正如联合国在中东的调解是必要的，在亚洲和其他地方进行调解可能也是必要的。”九月十九日的萨格勒布“消息报”也写道：“无论如何，福摩萨海峡的冲突，也一定将在联合国内讨论。”大家知道，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根本无权过问属于一国内政的问题。联合国如果真想执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职责，它倒是有事做的，那就是应当严厉谴责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要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立即撤出它的侵略军队。可是，看来这个联合国距离能做这种正经事的地步还差得很远。铁托集团现在却急不可耐地鼓吹什么联合国调解，这是为什么呢？很明显，铁托集团的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制造舆论罢了。

为了替美国反动宣传帮腔，铁托集团还从美国国务院那里抄袭了许多诬蔑中国人民的词句。他们为了诬蔑中国人民“一日千里”的大跃进和伟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竟然硬说：中国的内部具有极大的“困难”。按照铁托集团报纸的描绘，中国的情况简直不妙到极点了。铁托集团在十月十五日的萨格勒布“消息报”上甚至说，人类从来



“没有经历过象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所经历的这种程度的官僚主义退化和非人道化”。“战斗报”也刊载了誣蔑我国人民公社的长篇报道。十月二十三日，铁托亲自出马来攻击了。他在诺沃梅斯托发表演说，再一次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无耻的誣蔑。在提到中国的时候，铁托说：“他们有一些困难，而且困难是很大的，……他们希望越过这些困难，有时候他们在他们自己国家以外的地方想办法。”铁托还放肆地誣蔑我国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农户在自愿的基础上建成的人民公社，说它们是“军事公社”，“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观念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当然，所有这一切誣蔑，绝不能使中国人民的伟大成就有丝毫减色；相反的，只不过是向全世界表明铁托集团已经堕落成为杜勒斯的走卒，堕落到同美国反动派唱对口相声的地步。杜勒斯说：“在中国的‘公社’制度下，人的个性和人格是要予以否定的，他（她）只被看作是一个物质单位。”铁托集团说：“在中国把千百万人变成机器”。杜勒斯说：中国正在把一种“名字叫做公社的、落后的、大规模的奴隶制度强加在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头上”。铁托集团说：中国人民遭受着“非人道化”的统治。杜勒斯说：“中国共产党统治者认识到，他们正在作的事情一定会引起中国人民的仇恨，因此，他们设法把这种仇恨从他们自己身上转移开去，而针对着外国人。”铁托说，中国正遇到极大的“困难”，并且为了“越过

这些困难”，要在“自己国家以外的地方想办法”。请看，他们的言论竟是如此一致，把他们的名字对调一下，也简直不会引起什么困难。

在杜勒斯这样的帝国主义者的心目中，中国人民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那才叫做“有个性”和“有人格”；而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奋发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那就叫做“奴隶制度”。帝国主义的逻辑当然只能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铁托集团的腔调，也同帝国主义者一模一样？原来，奴才为了向主子讨赏，就不得不跟着主子学舌，为主子效驰驱之劳。这就是全世界人民为什么厌恶帝国主义的走狗同厌恶帝国主义者一样的缘故了。

铁托集团对于台湾问题的各种言论，只是铁托集团歪曲、誣蔑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效劳的许多谬论的一小部分。然而，从这一小部分材料已经足够看出这个叛徒集团的嘴脸。纸包不住火，伪装不能遮尽本来面目。客观事实比任何诡辩更有力。在事实这面照妖镜下面，现代修正主义者不能不显出原形。

更正：本刊一九五八年第十四期第二十三页左栏第六至七行，二千七百四十立方公尺，应为二千七百四十立方公尺。

